

《自庄严堪善本书影》读后

周启乾

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9月初版发行的《自庄严堪善本书影》，收录了先祖父叔弢先生（1891-1984）积毕生精力搜集的七百余种古籍善本的书影，“琳琅满目，美不胜收”（郑振铎语），这不仅是对先人劳绩的纪念，也有助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研究我国书籍印刷发展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

弢翁年青时，由阅读张之洞《书目答问》、莫友芝《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而引起兴趣，走上了搜集和收藏古籍之路。以往的藏书家常要“子孙永保”，甚至声称“鬻及借人为不孝”。弢翁藏书则是出于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热爱，而并非为了满足于个人的占有。早在1916年（丙辰），他在所收有翁方纲、许乃普等题跋的明刻《玉台新咏》上即题有“丙辰冬十二月归自庄严堪暂藏”。1926年（丙寅）夏，在明版《两汉纪》的题跋中又写道：“余所得善本书每钤‘曾在周叔弢处’六字朱文印，盖收书只以遮眼，本无世藏之心，非好为旷达之语以欺人也。今此印刵弊，不堪复用，遂改钤‘周遍’二字白文小印，自此书始，后皆从之。”至1942年（壬午）元旦，鉴于沦陷区的恶劣环境，“生计日艰，书价益贵”，便在手订所藏善本书目卷首更加明确地写道，“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我子孙私守之”，希望于“四海澄清，宇内无事”时，“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新中国的成立使这一多年夙愿得以实现。

1952年，弢翁将所藏宋、元、明刻及钞、校善本古籍捐献给国家，由北京图书馆庋藏。时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著名学者郑振铎在致弢翁信中盛赞“化私为公，造福后人，先生之嘉惠”，并“敬代人民向先生致极恳挚的谢意”。北图善本部负责人赵万里（斐云）先生筹划编一附有书影及名人题跋的书目，但经历次干扰，一直未能实现。1981年弢翁九十生日时，始由赵万里先生的弟子冀淑英先生编成《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并由弢翁亲自选定精品五十种印为书影，附于卷首。遗憾的是，限于当时的印刷条件，缩印甚小，效果不佳，迨至1985年出版时，弢翁已不及见。又时隔二十馀年后，姗姗来迟的本书可以说是终于完成了几代人的心愿。知名版本目录学家冀淑英、黄裳先生作序，

论述“自庄严堪”藏书的特色与贡献,引领读者得以探秘这一鲜为人知的宝藏。

笔者早年随侍祖父身边,只知家中书箱成列,高及屋顶,祖父书房更是孩童禁地而绝少涉足,终因年幼而难窥“自庄严堪”堂奥。1991年纪念弢翁百年诞辰,京、津两地举办展览,也展出了少量“自庄严堪”珍本古籍。令人兴奋的是得以初见这些国之瑰宝,但隔橱窗相望总难免不能满足之感。如今《书影》出版,则多少有所补救,一册在手有如坐拥书城,不仅可以走近“自庄严堪”藏书,而且走近它的主人,也加深了对祖父的认识。

二

“自庄严堪”藏书十分注重善本古籍的递藏源流,其中多见明、清知名藏家留下的痕迹,如毛氏汲古阁等。士礼居黄丕烈的校跋本更达数十种之多。此外,还不乏钱谦益(牧斋)、钱曾(遵王)、顾广圻(千里)、吴騫(兔床)、吴翌凤(枚庵)、鲍廷博(以文)等人的手校书籍。一册在手有如面对古人,作为校雠学的重要资料尤为难得。

古籍中的累代藏书印章同样令人目不暇接。上至皇家玺印,如“天禄琳琅”、“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五福五代堂宝”、“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以及明、清宗室藏印,如“晋府图书”、“晋府书画之印”、“敬德堂图书印”、“怡府世宝”、“安乐堂藏书记”、“明善堂览书画印记”、“礼邸珍玩”、“定府珍藏”、“曾存定邸行有恒堂”、“果亲王府图书记”、“宗室盛昱收藏图书印”、“玉牒盛昱”、“国子监祭酒盛昱印信”等。

民间著名藏家的钤印更是洋洋大观,早者如宋、元之间的俞琰、俞贞木祖孙,明末至有清一代如钱谦益的“钱印谦益”、“牧翁”、“蒙叟”,钱曾的“虞山钱曾遵王藏书”、“钱曾”、“遵王”、“钱曾之印”、“述古堂图书记”,毛氏汲古阁的“汲古阁”、“汲古阁图书记”、“汲古主人”、“汲古阁主人毛晋之印”、“虞山毛氏汲古阁收藏”、“毛晋之印”、“毛氏子晋”、“毛晋私印”、“开卷一乐”、“子晋”、“字子晋”、“子晋氏”、“毛凤苞氏”、“毛晋字子晋一名凤苞字子九”、“海虞毛表奏叔图书记”、“毛表奏叔”、“毛扆之印”、“斧季”,季振宜的“季振宜字洗兮号沧苇”、“季印振宜”、“振宜之印”、“季振宜藏书”、“沧苇”、“季沧苇图书记”,徐乾学的“崑山徐氏藏书”、“崑山徐氏家藏”、“徐乾学印”、“乾学”、“乾学之印”、“徐健庵”、“健庵”、“健庵收藏图书”,黄丕烈的“士礼居”、“士礼居藏”、“黄印丕烈”、“尧圃”、“尧圃手校”、“尧翁”、“尧翁手校”、“复翁”、“百宋一廬”、“宋廬”、“平江黄氏图书”等。

晚清王韬(字紫诠,号仲弢)作为近代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对于中西与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也有重要贡献,人们熟知其“天南邈叟”、“弢园老民”等别号,但他于光绪壬午(1882)在明刻《研北杂志》的题识后,却钤有“身历四代

足遍三州”朱方与“欧西经师日东诗祖”白方两印,从中亦足见其狂放性格。

清代中晚期崛起于北方的杨氏海源阁,其四代主人的藏书印章共有数十种之多,令人目不暇接。浏览所见,即有“聊城杨氏所藏”、“海源阁”、“东昌杨氏海原阁藏书记”、“杨氏海源阁藏”、“东郡杨氏海源阁珍藏”、“杨氏海源阁鉴藏印”、“海源残阁”、“宋存书室”、“东郡宋存书室珍藏”、“东郡杨氏宋存书室珍藏”、“东郡杨氏鉴藏金石书画印”、“四经四史之斋”、“杨以增字益之又字至堂晚号冬樵行式”、“杨印以增”、“以增之印”、“以增私印”、“至堂”、“杨东樵读过”、“杨绍和”、“东郡杨绍和”、“东郡杨绍和印”、“臣绍和印”、“绍和协卿”、“协卿”、“杨氏协卿平生真赏”、“协卿珍赏”、“杨氏彦合”、“彦合”、“彦合珍玩”、“彦合珍存”、“东郡杨二”、“杨二”、“臣和”、“仪晋观堂”、“绍和筠岩”、“绍和彦合”、“东郡杨绍和彦合珍藏”、“杨绍和藏书”、“史馆纂修”、“秘阁校理”、“道光秀才咸丰举人同治进士”、“东郡杨绍和鉴藏金石书画印”、“杨彦合读书”、“杨绍和读过”、“杨绍和审定”、“杨绍和鉴定”、“杨绍和曾口观天禄琳琅秘籍”、“先都御史公遗藏金石书画印”、“墓田丙舍退思庐主人”、“墓田丙舍炳烛读书”、“杨保彝印”、“杨保彝藏本”、“杨承训印”、“杨印承训”、“聊城杨承训珍藏书画印”、“聊城杨承训鉴藏书画印”、“聊城杨氏四世庋藏”等。杨氏四代藏书钤印的种类和数量虽然远超前贤,令人叹为观止,但其维持不过百余年也终于未能避免云烟之散。至1920年末期,由于社会动乱,连遭兵匪洗劫,使海源阁藏书受损并开始散出。也正值此时,弢翁倾力从杨氏后人处直接收得海源阁书五十余种,入藏“自庄严堪”,使之得以完好保存。这些珍贵古籍的聚散离合,怎不令人感慨系之。

三

《书影》中对于祖父与时贤同好的交往也多有反映,尤其与著名藏书家傅增湘的忘年之交令人瞩目。书前所附傅增湘《周君叔弢勘书图序》手迹,文词与书法俱佳,据说是他受托三年之后才动笔的精心之作。文中形容弢翁为人“貌婉而神清,才敏而志定,澹声色,薄滋味,寡气矜,畏荣进,怡然淡然,若与世无竞者,独于古书秘籍,则深嗜笃好,专精奋气,以肆求索,若疾病之待药饵,而饥渴之思饮食也”,可谓惟妙惟肖。“自庄严堪”藏书中,有傅增湘题跋或题识达二十馀处之多,两人交往之密切实所罕见,正如傅序所说,“余每过津门,辄诣君欣赏,尽出新获以相质证,每当午窗晴旭,夜漏风清,吾两人展卷细读,相对忘言,宛如坐澹生堂中,有缥函朱榻风过铿然之趣,逸情高致,固难为不知者道也。”

弢翁与藏园老人之间,经常互借古籍用以校刊,共享读书之乐,后者也居间为弢翁介绍和代购书籍,乃至向书商谐价。《两汉纪》书中留下的两纸便笺,读来即饶有兴味。其一,乙丑(1925)除夕,藏园老人自北京致函弢翁,详述了书商关于《简斋诗》、《史通》、《两汉纪》、《宏秀集》等书的要价。其二,藏园

老人于次年再度来津,并于抵达后即写来便笺称,“上车时又送来《汉纪》黄、冯校本,索五百元,视各本补脱漏极多,罕秘之至,若二百餘元可得,拟自留之,再多则或捨去,然公能留亦大妙,可从容临校也。餘俟面罄。”在落款“增湘叩首”后又缀有二句称:“三点时或在北安利一叙何如?子有约十二点半至一点半起士林早餐,或来此亦可。”于此可见两人在共同的爱好上既有竞争,更有合作与惺惺相惜的一面。正是通过藏园老人之介,弢翁购藏了这部有明、清著名藏书家冯舒(已苍)、黄丕烈题跋的明刻《两汉纪》。

清乾隆雅雨堂版《文昌杂录》由嘉庆举人沈钦韩(字文起)于道光壬午年(1822)校注并跋,还有傅增湘题识称,“壬申(1932)十月藏园居士手临一过,竟日而毕”。书后所附“增湘拜复”的短笺称,“文起手校书殊少见,此帙校笔虽不多,然改定错简三处乃致佳,似可留之”,可见同样是在傅的推荐下入藏此书。

杨守敬(惺吾,又号邻苏老人)于晚清赴日访书,带回了不少稀见古籍。日本刻本《三教出兴颂注》上,即有京都梅尾山著名真言宗寺院高山寺的收藏印章,可见其正是相当于中国元、明之际的五山文学的产物。书上还有杨守敬的肖像,并钤有“杨印守敬”、“星吾海外访得秘笈”等印章,表明该书系由杨自东瀛带回。书后所附傅增湘致弢翁短笺称,“友人徐森玉近去其藏书,中有五山版《三教出兴颂》、明钞《环溪诗话》均为秘本,特以介于左右,祈鉴赏为幸!此致叔弢三兄左右。”可见此书也是由傅推介而入藏“自庄严堪”。此外,还有元刊《大广益会玉篇》、《广韵》等,也都是杨守敬自东瀛携归,并有叶昌炽光绪乙酉年(1885)题跋及其“颂鲁眼福”印。

傅增湘的藏书在其生前已有相当部分流往日本,据戊寅(1938)二月劳健(笃文)在清初毛氏汲古阁景宋抄本《东家杂记》中题跋,可知此书即是“江安傅氏旧藏,癸酉岁(1933)叔弢得之日本文求堂”。著名的更有宋版《东观余论》,弢翁在题跋中详述其购书经纬称:“癸酉正月获见日本文求堂书目,著录宋元明本凡百餘种,其中多沅丈旧藏,余尝于双鉴楼中得摩娑者,尤以北宋本《通典》、绍兴本《东观余论》为最早秘,盖海内孤本也。《通典》索价一万五千圆,余力不能贖,乃以日金一千圆购此书归国,聊慰我抱残守阙之心。”此后,《通典》被确定为日本的“国宝”而不准出口。弢翁在题跋中进一步联系当时形势称:“今者边氛益亟,日蹙地奚止百里,当国者且漠然视之而无动于中,余乃惜此故纸,不使沦于异域,书生之见亦浅矣,恐人将笑我痴绝而无以自解也,噫!”在这里,忧国之情与爱国之心跃然纸上。迨至多年以后,笔者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第一次赴日学习时,祖父仍谈起这段往事,并嘱我在彼了解文求堂及其老板田中庆太郎的现状(后知其已于战后停业)。

清末知名学者劳乃宣之子劳健(笃文)是祖父早年家塾中的同学,后又长期共事,二人友谊终生不渝。劳精于书法,小楷之妙尝被誉为近百年来所仅有。在“自庄严堪”藏书中,多有劳的题跋。宋刻《兰亭续考》只存半部,弢翁即倩

劳以精楷补写，配成全书。劳在写于甲戌（1934）正月的跋文中谦称，“拙书续貂陋劣，愧不相称，幸佚册倘犹在人间，会有延津剑合之时，姑视此为筌蹄，以俟异日覆瓿可耳。”

罗振玉（雪堂）与“自庄严堪”的文字缘可见其丁卯（1927）冬在宋刊《妙法莲华经》后的题跋。此书书后标识刊印者部分遭受蠹蚀，罗则根据其在东瀛观书的经验，辨认为“临安府众安桥南贾官人经书铺印”。罗跋称，“‘贾’字上半蠹蚀，知为‘贾’者，经岁在海东于德富苏峰许见佛国禅师《文殊指南图赞》后有牌子曰‘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贾官人宅刊’，故知此所蠹蚀处为‘贾’字也。”罗进而分析称，“宋代刊本杭州为最，蜀、闽次之，……今之谈宋本者，鲜不知有陈、尹诸家，惟贾官人之名仅于此经及《文殊图赞》见之。”

袁克文（寒云）于戊辰（1928）秋在宋刊《景德传灯录》后以篆字题写“宋绍兴刊本景德传灯录残卷”，并跋称，“叔弢所藏《景德传灯录》残本，见者多目为北宋刊本，叔弢疑之，因以示予，且出倭人岛田翰所著《古文旧书考》所录宋绍兴明州本《文选》刊工姓名为证，盖工人姓字多与此书同，于以知叔弢之鉴赏为精确，而佞宋者安得以绍兴工人为北宋耶？”这也正是反映弢翁严谨态度的一例。

著名中西交通史学者向达（觉明）于1952年7月在清彭氏知圣道斋抄本明巩珍《西洋番国志》后题跋，道出了此书的重要学术价值。他写道，“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彭氏知圣道斋著录以后湮没无闻，又历百余年，治郑和下西洋历史者以为憾焉。中华人民解放之第一年，余知周叔弢前辈藏知圣道斋抄本巩氏原书，遂因哲嗣一良先生之介假归录副，多年积想一旦获偿，其欣慰之情可知也。近世藏书家大率锦镶牙轴，闷不示人，叔弢前辈藏书之富甲于北国，顾不如是，近且将以所藏善本献诸国家，其卓识雅量高出时流远矣，因亟将巩氏书缴还，并志数语藉表钦迟之意云尔。”此后，由向达先生校注，此书作为《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之一种，于196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它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一起，成为人们了解郑和下“西洋”的最基本史料。

四

本书每种书影下方的文字说明，除了记载书名、著者、时代、题跋以及版式尺寸外，也列举出递藏印章，为阅读提供了方便，但其中有的不够完整而有所遗漏，有的未尽依时代次序而有所颠倒，有的则文字与实物略有出入，或属误植。例如，211页“海虞毛表奏叔图书记”印章中之“海虞”误作“古虞”；262页“鍊（铁）岭王氏”误作“钱岭王氏”；264页和476页“遇者善读”分别误作“遇者读善”和“遇读善者”；388页李更生“字南枝”误作“安南枝”；501页“价藩宝此过于明珠骏马”中遗漏“明珠”二字；564页“仪晋观堂鉴藏甲品”之“仪”误作“隣”、“鉴”误作“览”；753页“诗龛书画印”误作“诗龛手画印”、“完颜景贤字亭父号朴孙一字任斋别号小如龛印”遗漏“小如”二字；1010页“瀛海

《四库全书》本宋曹彦约《昌谷集》误收陆游文

王 政

《四库全书》“别集类”宋曹彦约《昌谷集》卷七收《与尉论捕盗书》一文(《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曹彦约《昌谷集》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7页)。此文又见于《四库全书》“别集类”陆游《渭南文集》卷十三,文全同。

按,《与尉论捕盗书》实陆游文,作于宁德主簿任上。《渭南文集》系陆游生前自编就,《渭南文集·跋》所谓“先太史未病时,故已编辑”(《陆放翁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第319页),其子陆遁于嘉定十三年刊刻,不会有误。

《四库全书总目·〈昌谷集〉提要》云:“文集乃湮没不显,《宋史·艺文志》亦不着录。惟焦竑《国史经籍志》有《昌谷小集》二十卷。钱溥《秘阁书目》亦有《曹文简公集》十五册。然亦久无传本。……今考《永乐大典》,载彦约诗文颇多。核其篇目,……谨类次排纂,厘为二十二卷。”可见,曹氏《昌谷集》乃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与尉论捕盗书》一文当是四库馆臣误辑。此误,《全宋文》亦因之,未作辨明(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93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5页)。又,辑本《昌谷集》卷三有七言绝句21首,题为《偶成》,这些诗在《永乐大典》八百九十六卷中即录在“曹彦约《昌谷集》”目下,而它们又见于《四库全书》“集部”宋杨简《慈湖遗书》卷六;故有学者指出,此误原误在《永乐大典》,而四库馆臣又误辑之(傅璇琮总主编《中国古代诗文名著提要·宋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88页)。《与尉论捕盗书》误为曹彦约文,当亦属此类。只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永乐大典》残本中所刊的曹彦约诗文资料虽有诗380余首、文260余篇,但《与尉论捕盗书》一文不在其中,故无从知晓该文在《大典》中的实际著录情形。

作者工作单位: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僊(仙)班”误作“瀛海俺斑”等,余不一一。

一部大书,容有误植。在关于印章的说明文字之外,25页“天隅”应作“无隅”,即“联圣”方地山(尔谦);48页“清嘉靖”应作“明嘉靖”;502页“丹丘县刊”应作“丹徒县刊”;1708页“多纪康顿”应作“丹波康赖”;496页书影系《史通》中缪荃孙临顾广圻题跋,但小标题却作“缪荃孙临黄丕烈跋”。此外,1615至1616页明项氏万卷堂刻本《东观余论》,钐有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朱文长方印、“涵芬楼藏”白文方印及“海盐张元济经收”朱文方印,但在文字说明中却未予涉及,令人费解。

作者工作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